

1950年代《雷震日記》中的「反對黨」與 胡適

——一個數位人文的分析

薛化元*

摘要

探討特定人物的思想主張，固然從他撰寫的文字中進行分析是最重要的途徑，但是從另一個層面來看，檢視他的具體作為也是分析他思想主張的另一個重要側面，甚至透過他的具體作為更可以呈現思想主張尋求實踐落實的內涵。

因此，本文以《雷震日記》記載的胡適與反對黨的關係作為研究的主題，在某種意義上也正可以呈現，胡適在1950年代臺灣反對黨運動主張中的角色及歷史的定位。早在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到臺灣之前，胡適就是國民黨黨內抱持民主反共人士，或是在尋求在國民黨外另建政治組織的政治人物心目中的理想領導人選，在臺灣的歷史脈絡中，無論是臺灣本土菁英或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自由派菁英，在尋求成立反對黨或是政治團體，乃至於要在國民黨外建立一個支持蔣介石採取民主反共路線的團體，胡適的角色始終舉足輕重。但是，胡適在二

* 作者現為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與歷史學系合聘特聘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次大戰之後與蔣介石的關係也相當密切，支持蔣介石，特別是在與中國共產黨的對抗中支持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黨當局，是胡適重要的價值取向。

胡適對兩黨政治或是對反對黨運動的主張，對於戰後臺灣反對黨運動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動力，而他始終不願意參加在臺灣組織的反對黨，更遑論擔任反對黨的領袖，這也影響了臺灣反對黨運動的發展，失去了胡適的保護傘，反對黨運動繼續發展的結果不免遭到國民黨當局的打壓，而胡適終究只能扮演雷震案爆發後採取聲援或某種程度援助的歷史角色。

關鍵字：胡適、雷震、反對黨、數位人文、《雷震日記》

The Research of Hu Shih and Opposition Party in *Lei Chen's Diary*:

An Analysis of Digital Humanities

Hua-yuan Hsueh^{*}

Abstract

In the past, humanities scholars considered textual analysis as a major approach to study the concept of a policy and its opinions in regard to historical figures. With the increasing usage of digital humanitie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to ideology analysis has become more critical.

In this paper, I will use Digital Humanities method to discuss “Hu Shih,” the term with the highest word frequency in *Lei Chen's Diary*.

The result suggested that Lei Chen assumed that Hu Shih's great fame could be used as a kind of protective shield for the infant Opposition party, which was called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However, Hu Shih supported the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but had no interest in its practical management. After Lei Chen was arrested in 1960

^{*} De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n Chiang Kai-shek's order, despite Hu Shih's endeavor to save Lei, it was to no avail.

Keywords: Hu Shih, Lei Chen, opposition party, digital humanities,
Lei Chen's Diary

1950年代《雷震日記》中的「反對黨」與 胡適

——一個數位人文的分析*

薛化元

一、前言

根據既有的研究成果，無論就臺灣本土菁英或是外省籍自由派菁英而言，1950年代在臺灣主張成立的反對黨都與胡適（1891-1962）有密切的關係。相對地，從胡適本人的記載來看，對於反對黨運動固然某種程度持支持的態度，但是，對於自由派政治菁英希望他擔任反對黨的領導人，則相當保留，不願接受。如此，不免使人好奇，究竟是何種的氛圍使得不願擔任反對運動領導人的胡適，成為1950年代臺灣推動反對黨的行動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胡適長期以來主張民主憲政上應該有反對黨（在野黨）的存在，但是他的

* 本篇論文感謝余佩真博士費心整理相關文獻，程意雯小姐核算相關程式篩選的統計數字。至於根據人工處理的計量分析，並非本文的主題，將再另文處理。本文曾在2018年11月15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近代東亞的人權概念與實際」學術研討會宣讀，會中潘光哲研究員和與會學者提出修正建議，投稿後承蒙匿名審查人提供修正意見，使本文更具可讀性，特致謝忱。

主張和具體實踐的關係又是如何？就此而言，檢視他的具體作為也是分析他思想主張的另一個重要側面，甚至透過他的具體作為更可以呈現思想主張尋求實踐落實的內涵。

本論文是以 1950 年代臺灣反對黨運動要角雷震（1897-1979）的日記作為主要的文本，並採用數位人文的取徑，討論在《雷震日記》中胡適與「反對黨」的關係。不過，對來自中國大陸的自由派菁英而言，在 1950 年代討論胡適與類似政黨的組織關係時，一開始並不是為了反對蔣介石（1887-1975）領導的國民黨，而是為了結合國民黨外主張民主反共的人士，「擁蔣反共」。之後，則是基於民主政治需要兩個政黨制衡，而討論組織新的反對黨（在野黨），一直到晚期才有與臺籍菁英組織與民意、選舉結合的反對黨主張。因此，實際討論的「反對黨」概念，還包括了「自由中國運動」、「自由中國同盟」、中國自由黨、¹在野黨、組黨、新黨、組織黨、中國民主黨、兩黨政治等詞彙。

從 1950 年 1 月直到 1960 年 9 月 4 日被捕為止，《雷震日記》幾無間斷記載雷震與友人的互動，以及對於時事發展的議論。其中，「反對黨」是重要的議題之一。因此，在研究取徑上，基本上是先以電腦程式篩選《雷震日記》相關的內容，再進行討論。究竟哪些人士在《雷震日記》中是與反對黨同日出現呢？哪些人出現的次數又比較多呢？就計量而言，本論文採用權威詞概念的詞頻分析，並藉由資訊

¹ 自由中國運動或是自由（中國）同盟的意涵在 1948、1949 年間是相當複雜的，包括在中國大陸、美國還有在臺灣推動的。詳見金恆煒：〈胡適的「容忍」與殷海光的「自由」〉，《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臺北：允晨文化，2017 年），頁 397-401。本文所指的，是原本在中國大陸上海，後來在臺灣，王世杰、雷震等人參與，希望胡適領導的這個脈絡，而《自由中國》雜誌則是這個運動最重要的成果。而中國自由黨則是蔣廷黻在美國積極推動的，也尋求胡適的支持，希望胡適適應出面領導。金恆煒：〈胡適的「容忍」與殷海光的「自由」〉，頁 402。本文有關胡適與蔣廷黻在美國組黨互動的認識，是得自金恆煒研究的啟發，特致謝忱。也感謝主辦單位的安排，在新書發表後有機會和金先生一起座談。

自動化詞頻採計篩選出日記記載有關人名詞彙。就此而言，研究團隊根據既有的研究，以及透過對《雷震日記》閱讀的基礎，先建置相關人物及反對黨的權威詞。如雷震的好友王世杰（1891-1981），在日記中可能是以雪艇、雪公、王秘書長等等的各種稱呼出現，因此必須分別納入計算加總，才不致脫漏。

如此，就「反對黨」議題而言，胡適在《雷震日記》所占的份量到底如何？進而探討《雷震日記》記載中胡適與「反對黨」的關係。為了避免特定日子、特定人物出現過多，若要進行分析時，無法討論特定人物在多少天被記錄。因此，本計畫團隊自建的《雷震日記》資料庫，特別以天作為單位，採取一天一篇的方式建置。

二、《雷震日記》中的自由派人物與「反對黨」

基於前述的研究構想，本論文先對《雷震日記》進行數位探勘，再刪除雷震家屬的部分，人名關鍵詞的出現以 80 次以上且非雷震家屬身分者作為篩選判準，結果如表一：

表一：1950-1960 年《雷震日記》人名（非家屬）辭頻超過 80 次以上的統計

字詞	詞頻
胡適	1,324
王世杰	843
蔣勻田	622
張群	571
蔣介石	455
夏濤聲	423
陳誠	411
陳 天	334

字詞	詞頻
王世憲	305
成舍我	270
許孝炎	249
齊世英	235
黃少谷	231
何應欽	227
徐復觀	212
端木愷	207
李萬居	202
程滄波	201
蔣經國	187
殷海光	183
洪蘭友	177
湯恩伯	176
吳三連	173
夏道平	163
左舜生	158
胡秋原	147
張其昀	146
張君勱	143
王雲五	142
王新衡	136
陶希聖	127
戴杜衡	116
吳國楨	105
楊浚明	104
毛子水	104
高玉樹	103
王師曾	101
陶百川	100

字詞	詞頻
黃中	93
谷正綱	93
孫立人	87
郭雨新	85
張厲生	84
阮毅成	83

根據前述計量分析，可以發現在 1950 年到 1960 年的《雷震日記》中，非家屬部分提及次數最多的人士就是胡適，詞頻超過 1,300 次。² 由此可見，胡適在雷震記錄日記時的重要性。

再就本論文研究的「反對黨」議題進行分析，計算 1950 年到 1960 年《雷震日記》中與「反對黨」議題同時出現的人名篇數（天數）。研究的程序是先羅列所有與反對黨相關的詞彙，包含反對黨、在野黨、組黨……等等，將雷震日記中有出現以上任一反對黨相關辭彙的日記搜尋出來，並將已知六篇記敘為「組織」、實為「組黨」的日記加入，作為雷震日記反對黨議題資料庫。在上述雷震日記反對黨資料庫中搜尋人名（包含權威辭，例如胡適之、適之、胡先生等都是指胡適），再依年份製作出統計表格。結果如表二：

表二：1950-1960《雷震日記》中與「反對黨」相關，胡適等人的篇數統計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總計
胡適	13	3	6	3	7	3	3	22	29	16	29	134
夏濤聲	0	0	0	5	6	4	5	7	16	9	50	102
蔣勻田	7	2	3	6	3	3	8	12	5	6	23	78
成舍我	1	1	0	0	1	2	5	10	19	10	19	68

² 家屬部分提及最多的是宋英的 141 次，但次數遠少於胡適。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總計
王世憲	0	0	0	0	0	0	3	10	20	9	18	60
王世杰	15	2	0	6	5	2	3	5	7	5	4	54
李萬居	0	0	0	0	1	0	3	2	4	9	33	52
齊世英	0	1	2	0	1	2	1	3	9	3	25	47
高玉樹	0	0	0	0	1	0	0	3	1	2	39	46
吳三連	0	0	3	0	0	0	0	2	6	6	23	40
郭雨新	0	0	0	0	0	0	1	1	6	3	27	38
端木愷	1	2	4	0	1	0	1	5	8	6	9	37
夏道平	2	2	0	1	1	0	1	4	6	5	13	35
陳啓天	2	0	1	6	3	4	1	4	1	7	3	32
謝漢儒	0	0	0	0	0	0	0	0	0	1	24	25
戴杜衡	1	1	1	0	2	0	1	2	5	4	8	25
程滄波	1	1	3	0	2	1	0	3	11	2	1	25
胡秋原	0	0	0	2	1	1	0	3	10	5	1	23
傅正	0	0	0	0	0	0	0	0	2	0	19	21
楊毓滋	0	0	0	0	1	0	0	0	0	1	17	19
劉博崑	0	0	0	0	0	0	1	2	5	3	5	16
楊金虎	0	0	0	0	0	0	0	2	0	0	13	15

根據表二的數位探勘結果，胡適與「反對黨」議題同時出現在《雷震日記》的天數（篇數）有 134 天，依然是次數最多的。其次則是夏濤聲（青年黨籍）102 次、蔣勻田 78 次（民社黨籍）等人。

由於 1957 年是臺籍菁英開始積極試圖結社，希望以團體的力量在地方選舉中與國民黨抗衡。當年地方選舉過後，為檢討選舉所開的檢討會上便決定組織關於自治法規的研究委員會，³ 並定名為「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但延至次年夏季才開始正式向政府申請登記，此一申請卻被延不批覆，「復加嚇阻與破壞」。⁴ 而在這個研究會申請立案

³ 雷震：1957 年 5 月 18 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雷震日記（1957-1958）第一個十年（七）》（臺北：桂冠，1989 年），頁 95。

⁴ 朱文伯：〈理論與事實——漫談人權保障問題〉，《自由中國》第 19 卷第 11

時，雷震便已認為這是「反對黨之先聲」，卻認為此組織「地方色彩太重」，擔憂「將來可能流血」。⁵

相對於臺灣本土菁英，來自中國大陸的自由派人士從 1957 年起，對於「反對黨」議題也有與之前性質不同的主張。其中，《自由中國》在此議題的轉折，也發生在 1957 年。當年 2 月牟力非所寫的〈略論反對黨問題的癥結〉中，對於「祝壽專號」中出現的要求國民黨來扶植反對黨的看法提出根本的質疑。牟力非指出，在上述的討論中，彷彿反對黨問題的中心是繫於一人或某一黨的權力而定，似乎反對黨本身是「俯仰隨人」，身不由己，換言之，「亦即是反對黨本身並無力量，也不產生力量」。⁶他認為如果真像這樣來認識反對黨問題，那麼反對黨的前途實在令人不敢樂觀，因為這立場使人感覺成立反對黨的要求，乃求助於執政黨底「施捨」。⁷他更畫龍點睛的指出：「在野黨之欲求作為健全的反對黨，首須摒棄『求助』觀念，從健全自身以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為始」。⁸

就《自由中國》相關文章的內容來看，這篇文章標示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自此以後，《自由中國》對強大反對黨組成已不再期待國民黨，而這篇文章中也非常清楚的標示出強大的反對黨並不依靠某人

期，1958 年 12 月 1 日，頁 18-19。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 40 年》（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7 年），頁 72。

⁵ 雷震：1958 年 8 月 2 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346。

⁶ 牟力非：〈略論反對黨問題的癥結〉，《自由中國》第 16 卷第 3 期（1957 年 2 月 1 日），頁 11。原文為：「反對黨問題的中心，彷彿是：第一、反對黨的存亡，繫於某一人或某一黨的權力而定。第二、似乎祇要政府當局或國民黨總裁下個條子，宣布允許反對黨成立，或不加干涉反對黨的活動，則反對黨便應運而生了。……第三、好像是：具有操持反對黨存亡的權力者，只要一陣心血來潮，於是反對黨便加強了，力量便增大了。第四、似乎反對黨本身是『俯仰隨人』，身不由己；換言之，亦即是反對黨本身並無力量，也不產生力量。」

⁷ 牟力非：〈略論反對黨問題的癥結〉，頁 11。原文為：「如果真像這樣來認識反對黨問題，那麼實在令人不敢樂觀；起碼使人感覺呼籲成立反對黨的要求，含有很多的『求助』成分——求助於執政黨底『施捨』。」

⁸ 牟力非：〈略論反對黨問題的癥結〉，頁 11。

或某黨，而是在於是否有廣大民眾的支持，這也成爲日後反對黨推動的主要著力點。同年 5 月《自由中國》第一次將反對黨主張與地方選舉關聯起來，並將臺灣本土政治人物納入反對黨的思考。當檢討該年舉辦的地方選舉時，傅正即已指出，基於選舉，希望能由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以臺籍政治人士爲主）組成一個強大的反對黨。⁹

因此，再針對 1957 年到 1960 年的《雷震日記》文本進行數位探勘。結果如表三。胡適與反對黨議題同時出現在《雷震日記》的天數（篇數）有 96 天，依然是次數最多的。

根據前述的三份統計資料，可以發現 1950 年到 1960 年《雷震日記》提到次數最多的人是胡適 1,324 次，一般認爲與雷震關係最密切的王世杰排名第二 843 次（參見表一），是胡適的 63.67%。再就《雷震日記》記載與反對黨相關的內容來考察，提到胡適的天數有 134 天（參見表二），也是數量最多的。由於雷震是 1950 年代臺灣組黨運動的重要鼓吹者，特別是 1960 年中國民主黨籌組工作，雷震更有舉足輕重的份量。¹⁰ 因此，根據《雷震日記》記載進行 1950 年代反對黨課題的分析，選擇胡適作爲主題，確有其重要性。而在 1950 年代組織反對黨的主張在 1957 年到 1960 年是實際落實的主要時間，胡適在《雷震日記》相關篇數中也是最多的。不過，在投入中國民主黨組黨的 1960 年，提到胡適天數有 29 天已經落在與雷震共同擔任發言人李萬居（1901-1966）33 天、高玉樹（1913-2005）39 天之後（參見表三），就數量而言，顯示在雷震參與組黨行動上，與胡適的互動次數，較李萬居、高玉樹少。

⁹ 傅正：〈對本屆地方選舉的檢討〉，《自由中國》第 16 卷第 9 期（1957 年 5 月 1 日），頁 13。

¹⁰ 有關雷震參與、鼓吹反對黨行動內涵的改變及其意義，參見薛化元：〈臺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1949-60）：以反對黨問題爲中心〉，《思與言》第 34 卷第 3 期（1996 年 9 月），頁 241-286。

表三：1957-1960《雷震日記》中與「反對黨」相關，胡適等人的
篇數統計

	1957	1958	1959	1960	總計
胡適	22	29	16	29	96
夏濤聲	7	16	9	50	82
成舍我	10	19	10	19	58
王世憲	10	20	9	18	57
李萬居	2	4	9	33	48
蔣勻田	12	5	6	23	46
高玉樹	3	1	2	39	45
齊世英	3	9	3	25	40
吳三連	2	6	6	23	37
郭雨新	1	6	3	27	37
端木愷	5	8	6	9	28
夏道平	4	6	5	13	28
謝漢儒	0	0	1	24	25
王世杰	5	7	5	4	21
傅正	0	2	0	19	21
戴杜衡	2	5	4	8	19
胡秋原	3	10	5	1	19
楊毓滋	0	0	1	17	18
程滄波	3	11	2	1	17
陳啓天	4	1	7	3	15
劉博崑	2	5	3	5	15
楊金虎	2	0	0	13	15

備註：

由於電腦程式無法做完整的內容識別，爲了呈現完整「反對黨」的數位探勘結果，在此盡量不作人工調整，說明如下：

1. 無黨：應該 1957 年後開始才是，但此次計算從 1950 年開始就計入
2. 政綱：應該 1958 年後開始才是，但此次計算從 1950 年開始就計入
3. 座談會：應該從 1960 年 3 月開始才是，但此次計算從 1950 年開始就計入
4. 檢討會：應該從 1960 年開始才是，但此次計算從 1950 年開始就計入
5. 自由黨：19530810、19530916、19531009、19540820、19570910 這幾篇中的「自由黨」是指日本的自由黨，但此次計算沒有刪除，依然計入
6. 組織：19590214、19590425、19590427、19600521、19600601、19600627 這幾篇中的「組織」是指組黨，此次計算有計入

三、《雷震日記》記載的胡適與「反對黨」¹¹

目前已知胡適最早動念想要組黨是在 1926 年，他在日記自承：「我應該出來作政治運動，以改革內政爲主旨，可組一政黨，名爲『自由黨』。」和他自由主義的政治傾向不同，此時，他認爲自由黨應該充分承認「社會主義的主張」。¹² 但此一想法只是曇花一現，當 1947 年 5 月北平的自由派菁英討論組織新黨的可能時，胡適則表明不參加標榜

¹¹ 本文有關中國自由黨的論述，包括對胡適早年對組黨想法，除了過去的研究基礎之外，部分的觀點也得自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一書的啟發，特致謝忱。感謝胡忠信在此書出版後，邀請我對談這本書。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臺北：大塊文化，2017 年）。

¹² 胡適：1926 年 8 月 3 日日記，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 4》（臺北：聯經，2004 年），頁 336-337。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頁 347。

社會主義的政黨。¹³直到1949年為止，胡適並沒有組黨的想法。¹⁴不過，在友人的印象中，胡適反對一黨獨大，對兩黨制相當心儀。¹⁵這種態度影響了胡適之後鼓吹反對黨，或對友人抱持支持或樂觀其成的態度。

二戰大戰結束後，1946年制憲國民大會期間胡適即被探詢是否會組黨？在記者招待會上，胡適表示：憲草已顧及全國人民意見，他絕不組黨。¹⁶而在1949年中國局勢丕變的狀況下，國民黨內部分裂，1月蔣介石下野，不再擔任國家元首，以國民黨總裁的身分，仍擁有相當決策權。國民黨內以王世杰、雷震等人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積極希望運作由胡適出面領導，採取「自由中國運動」的方式，結合具自由、民主傾向的菁英，擁護蔣介石，採取民主反共路線，和中共政權對抗。在某種程度上，這是臺灣外省籍自由派菁英試圖在國民黨外，以胡適為領導人結社的開始。

另一方面，胡適應蔣介石之請，於1949年4月21日抵達美國。¹⁷6月16日胡適被李宗仁（1891-1969）代總統、行政院長閻錫山（1883-1960）任命為外交部長不久後，曾與顧維鈞（1888-1985）談他的想法，《顧維鈞回憶錄》提到：「他雖不願意接受這一任命，但他打算回國領導一個開明內閣」。¹⁸胡適還對顧維鈞說：「他準備在9月份

¹³ 蔣廷黻：1947年5月30日日記，轉引自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頁345。

¹⁴ 胡適：1926年8月3日日記，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4》，頁336-337。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頁347。

¹⁵ 如顧維鈞便認為：「胡適像許多無黨派的政治思想家一樣，是一個兩黨制的堅定信仰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7》（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480。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頁347。

¹⁶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記（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頁585。

¹⁷ 胡適：1960年11月18日日記，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9（1953-1962）》，頁665-669。金恆煒：〈胡適的「容忍」與殷海光的「自由」〉，頁388。

¹⁸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7》，頁481。胡適辭職

回國，可能要組織一個自由黨，他覺得沒有這樣一個黨，想要通過改革扭轉乾坤，是不能有所作為的。」¹⁹ 此事固然不成，但是蔣廷黻（1895-1965）積極籌組中國自由黨，並邀請胡適參加，也影響了臺灣王世杰、雷震等人的想法。

（一）自由中國同盟

胡適對於「自由中國」的路線大抵上並不排斥，但是對於擔任運動的領袖，特別是政治運動的領袖，則相對消極，曾經向雷震等人推薦顧孟餘（1888-1972）和傅斯年（1896-1950）負責領導。欠缺胡適的投入，運動進展有限，雷震還為此寫信給胡適，表示：「自由中國運動」如果胡適不願出來領導，絕對沒有希望，請胡適同意領導這個運動。²⁰ 但是，胡適仍不為所動，除了原本撰寫《自由中國》的宗旨外，只是鼓勵友人繼續推動自由中國運動。²¹

不過，中國自由黨在美國的籌組工作，在蔣廷黻主導下積極展開。1949年8月24日蔣廷黻開始草擬自由黨綱，下午和胡適碰面時，胡適認為黨綱的構想很好，但不願意擔任領導人。²² 1949年8月29日，蔣廷黻與胡適討論國內外可以做為中國自由黨核心人物的名單。

後，6月28日「得閻百川先生一電，仍不放胡適辭職。」見胡適：1949年6月28日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冊號「1949年日記」檔號：HS-DY01-1949-0628。胡適收到閻錫山的電報後，在6月30日發三個電報：一給閻錫山，一給杭立武，皆堅辭外交部長事。一給蔣介石，告知宋子文梗電所說：「從未贊成，亦決不贊成。」胡適：1949年6月30日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冊號「1949年日記」檔號：HS-DY01-1949-0630。

¹⁹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7》，頁481。

²⁰ 〈雷震致胡適（暫繫年於1949年）〔殘〕〉，收入萬麗鵑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頁8。

²¹ 參見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新北：稻鄉出版社，1996年），特別是第二章、第六章相關的討論。

²² 蔣廷黻：1949年8月24日日記，轉引自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頁348。

蔣廷黻草擬完成中國自由黨黨綱之後，還根據胡適等人的意見，進行修改。²³1949年9月8日，蔣廷黻邀請胡適來晚餐，蔣廷黻給他一份自由黨綱，胡適則同意為自由黨贊助人之一。²⁴1949年10月14日蔣廷黻有備忘錄給胡適，請他出來領導自由黨。次日，胡適與蔣廷黻會面時，終於表示願意擔任自由黨主席。事後，胡適向蔣廷黻表示，他表示願意擔任黨主席，不想讓蔣太失望，他個人對中國自由黨欠缺信心。²⁵在《自由中國》雜誌於1949年11月出刊後不久，王世杰的兒子王紀五（1927-1991）最晚在1949年11月27日去看了胡適。²⁶胡適告訴他，和蔣廷黻組黨的狀況。王紀五迅速將相關資訊通知臺北的王世杰。12月3日王世杰通知雷震，收到王紀五的信。王紀五信中提到：蔣廷黻等人在美國籌組中國自由黨，也擬好了章程草案，胡適也表示答應要出任黨魁。²⁷另外，王紀五也將中國自由黨黨章寄回臺北，雷震在王世杰家看到後，登載在《自由中國》。²⁸

蔣廷黻在政治光譜上與胡適接近，基本上也採取擁蔣反共的路線。有關中國自由黨的籌組工作，他也託張佛泉帶信回臺北，尋求蔣介石的支持。雷震日記的時間是1949年12月3日，張佛泉（1908-1994）將信交給雷震，希望透過雷震—王世杰的路徑向蔣介石轉達組黨事宜，以及胡適答應擔任政黨的領導人，以便取得蔣介石的支持後，在臺北正式展開活動。雷震晚上就將信函和張佛泉的意見轉給王世杰，並表達他的意見，認為胡適與蔣廷黻等人先組成中國自由黨，然後網

²³ 蔣廷黻：1949年8月29日、9月1日日記，轉引自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頁348。

²⁴ 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頁349。

²⁵ 蔣廷黻：1949年10月15日、10月27日日記，轉引自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頁350。

²⁶ 胡適：1949年11月27日日記，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8（1940-1952）》，頁445。

²⁷ 雷震：1949年12月3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1》，頁376。書信傳遞如此迅速，可能是託友人帶回。

²⁸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12：雷案回憶（二）胡適與反對黨》（臺北：桂冠，1989年），頁349。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頁353-354。

羅各黨各派民主人士，在胡適領導下成立自由中國同盟，而在蔣介石宣布復職後，支持蔣介石。王世杰不反對雷震的意見，但更主張回到他們當初由胡適領導跨黨派人士組成自由中國同盟的構想。而且對於中國自由黨能否順利找到適合的發起人，也抱持保留的態度。²⁹

1950年1月3日，《自由中國》雜誌舉行編委會，雷震記錄他和許孝炎都主張先組中國自由黨，然後再組自由中國同盟的意見。當晚去向王世杰報告時，王除了說明已經將之前蔣廷黻、胡適組黨的事情向蔣介石報告了，蔣介石固然贊成，但是也認為蔣廷黻組黨應該先向他報告。杭立武（1903-1991）稍後才抵達，聽完雷震的意見後，認為必須有部分國民黨員脫黨加入中國自由黨，不然還是繼續推動自由中國運動，以後再組黨。³⁰ 雷震他們在臺北沒收到的訊息是，雖然1949年12月22日蔣廷黻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中國自由黨的基本態度與宗旨，表示新黨組成後胡適會出來領導，³¹ 不過，會後蔣廷黻去看胡適，胡適的態度已經轉為退縮，表示「從未想到政治上的權利」，蔣廷黻也只能期待中國自由黨能帶胡適「上路」。³²

1月7日晚上雷震和杭立武再到王世杰處，商議如何推動自由中國運動，共同認為必須胡適可以到臺灣才有可能進行。為了避免計畫淪為「空談」最後決定由雷震起草信函，請胡適「返國救國」，為了促成此事，除了王世杰同意共同簽署這封信外，也邀請傅斯年共同具名。³³ 兩天後，1月9日雷震拜訪傅斯年，傅表示同意「請胡適之返國主持自由中國運動」，也願意寫信給胡適。³⁴ 而在美國的胡適，也

²⁹ 雷震：1949年12月3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1》，頁394。

³⁰ 雷震：1950年1月3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2》，頁5。

³¹ 〈王紀五致雷震函（1949年12月4日）〉，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0：雷震書信集——雷震秘藏書信選》，頁58。金恆焯：〈胡適的「容忍」與殷海光的「自由」〉，頁402。

³² 蔣廷黻：1949年12月22日日記，轉引自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頁353。

³³ 雷震：1950年1月7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2》，頁9-10。

³⁴ 雷震：1950年1月9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2》，頁12。

在同一天寫信給王世杰、傅斯年和雷震，並託人帶回臺灣轉交。³⁵

胡適在寫給雷震的信中，一方面表達由於局勢已經改變，中華民國政府失去中國大陸的統治權，因此1949年4月寫的《自由中國》的〈宗旨〉「沒有提到國家的獨立」，內容已經不夠應付變局，因此請在臺北的友人，組成「一個『自由中國』的組織，細細討論一套切合今日需要的宗旨」。³⁶此時《自由中國》雜誌已經出刊，胡適提的組織應該是自由中國運動的意思，不過並沒有提到他是否到臺灣參與，而且在信中還表示不贊成用他的名字作《自由中國》雜誌的發行人。³⁷

另一方面，胡適是否要擔任中國自由黨領袖的事情，也引發外界的注意，1月12日傅斯年拜訪雷震提到《香港時報》的報導，並探詢雷震有沒有進一步的消息。³⁸1月15日雷震到王世杰家中，看到胡適寫給王世杰的信，信中胡適不僅沒提要擔任中國自由黨的領導人，還表示他未參加中國自由黨。而雷震則告知王世杰，胡適給他的信提及要臺北的友人組成「一個『自由中國』組織」，是贊成之前雷震推動自由中國運動的建議。王世杰則對胡適是否會回臺灣領導這個運動轉趨保留，認為只要胡適「答應領導就可以了」。³⁹由於胡適提到未參加中

³⁵ 胡適：1950年1月9日日記，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8（1940-1952）》，頁467。

³⁶ 〈胡適致雷震（1950年1月9日）〉，收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頁10。

³⁷ 雷震：1950年1月14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2》，頁16。

³⁸ 雷震：1950年1月1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2》，頁14。

³⁹ 雷震：1950年1月15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2》，頁16。關於蔣廷黻邀請胡適組黨的過程，蔣返臺時曾將經過向雷震說明：「綱領草成後，經適之先生多次修改，最後發表者，適之雖有一、二點不滿意，其餘是同意的。對領導一事，適之先前答應任名譽職，經渠一再邀請，並建議設一副的負責實際之責，適之亦允可予考慮。」除了之前透過王世杰向蔣介石說明外，他也透過蔣宋美齡向蔣介石提出組織中國自由黨的構想，之後蔣介石「沒有回信，大概是不贊成此事」，而他自己「因為控蘇案而工作繁忙，亦無暇及此也。」雷震：1951年4月8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3：雷震日記（1951）第一個十年（三）》，頁76。

國自由黨的原因是「其個人不適合於此項工作」，這也影響了王世杰等人後續推動自由中國同盟的走向。

雖然如此，雷震仍主張自由中國同盟應該是政治團體，因此他在1950年1月18日再寫信給胡適，「極力請其允諾領導自由中國運動。目前在自由中國區域，需有新政團之組織方可號召內外，如採用政黨方式，已有黨籍之人員則不便來參加，則不如組織一個超黨派之政團，方可網羅全國人才。此組織又必須由適之先生來領導，始可成功。」⁴⁰ 否則即使是蔣介石「出來亦不能有所作用。」⁴¹ 但是，雷震的友人和他的想法並不一樣。1月21日雷震約了王世杰、傅斯年、杭立武、毛子水（1893-1988）、許孝炎（1900-1980）、陳雪屏（1901-1999）、張佛泉討論胡適來信提到的組成「一個『自由中國』的組織」，大家認為胡適的建議必須要進行的，多數認為「非組黨，乃是一個運動，目前不必參加政治」。⁴² 參與者也決定各自撰寫「綱領」後，再到傅斯年處討論。至於名稱，則用「自由中國運動同志會」。⁴³ 雷震則仍未放棄原本的想法，認為組織「必為政治團體，不可僅以文化團體為已足」，⁴⁴ 2月2日再去找王世杰說明他的主張。⁴⁵ 次日，雷震和友人再到杭立武處討論，大部分的人由於擔心，如果是政治性胡適「不肯出來」，因此決定由「社會運動著手」，簡章則由王世杰起草。⁴⁶

1950年2月12日，雷震去拜訪王世杰，王告訴他：「已將致適之先生函寫好，組織及簡章已寫好」，⁴⁷ 除表明組織不涉及「政治」外，也邀請「適之任領導人，現在只有候其回信。」而為了避免必須邀請朱家驊（1893-1963）、陳立夫（1900-2001）擔任發起人，王世杰也

⁴⁰ 雷震：1950年1月18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2》，頁19。

⁴¹ 雷震：1950年1月18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2》，頁19。

⁴² 雷震：1950年1月2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2》，頁22-23。

⁴³ 雷震：1950年1月2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2》，頁22-23。

⁴⁴ 雷震：1950年2月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2》，頁31。

⁴⁵ 雷震：1950年2月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2》，頁31-32。

⁴⁶ 雷震：1950年2月3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2》，頁33。

⁴⁷ 雷震：1950年2月1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2》，頁33。

表明他「不可任發起人」。雷震也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減少糾紛」，有利於推動。⁴⁸3月1日蔣介石宣布復行視事，臺灣政局進入新的階段。⁴⁹3月31日王世杰寄信給胡適，強調他告訴友人，胡適是「不可替代的人」。不過，重要的是，王世杰在信中傳達了「自由中國運動」暫緩的訊息。⁵⁰此後，從《雷震日記》沒看到胡適正面的回應，自由中國同盟的事遂告一段落。

雖然如此，胡適仍然主張在臺灣有必要組織新的政黨。1951年5月，他寫信給蔣介石，提到：「數年來，我公曾屢次表示盼望我出來組織一個新政黨」，而胡適自己「沒有精力與勇氣，出來自己組黨」，不過他「屢次向國民黨朋友大談『國民黨自由分化，成為幾個獨立的政黨』之說」。胡適也試圖說服蔣介石，這樣組成新政黨的方式，「對內對外，都不容再緩了。」⁵¹

（二）外省籍菁英的組黨主張

1954年胡適返臺參加國民大會，3月11日餐宴之間，外省籍菁英向胡適提出組織反對黨的問題。當天參加餐會的人有「谷正綱（1902-1993）、谷正鼎（1903-1974）、程天放（1899-1967）、余井塘（1896-1985）、齊世英（1899-1987）、張清源（1894-1978，張希文之夫）、邵華、雷震。」⁵²胡適席間提到當時臺灣國民黨的改進和訓練工作是兩大失敗，同席的人則認為組織反對黨的必要性，並請胡適「向總統進言，請總統允許」，要胡適「出來領導」。⁵³3月13日雷震與青

⁴⁸ 雷震：1950年2月1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2》，頁33。

⁴⁹ 《中央日報》第1版，1950年3月1日。

⁵⁰ 〈王世杰致胡適函（1950年3月31日）〉，冊名「與王世杰的來往書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館，館藏號HS-US01-062-022。

⁵¹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10）》（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2003年），頁295。

⁵² 胡適：1954年3月13日日記，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9（1953-1962）》，頁87。

⁵³ 雷震：1954年3月1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5：雷震日記

年黨的成員見面，勸他們在左舜生來臺期間，調和內部的分裂。部分青年黨人的回應，則是想請胡適「組織黨」。⁵⁴ 之後，胡適返美，《雷震日記》有關他與反對黨的記載，也告一段落。

而蔣介石對於民社黨、青年黨部分幹部試圖組織反對黨，也掌握相當資訊。不過卻不以爲然。在 1954 年 10 月的日記中，記下：「國人如蔣勻田（1903-1994）等之無知不道，如何能建立反對黨，以步入民主憲政之常軌」。⁵⁵

1957 年，由於臺灣朝向民主憲政的常軌發展仍有相當困難，雷震和部分友人又在主張組織反對黨時，提到對胡適的期待。3 月 1 日的聚會中，陳啟天（1893-1984）主張推動由胡適領導的「超黨派運動」。雷震則回應，有人支持由胡適出來組織反對黨，「可吸收國民黨一部分及其他黨派合作組成一大黨」。此時雷震對此比較悲觀，認爲：「胡先生是不適宜此種工作，這也不過是少數人之幻想罷了。」⁵⁶ 不過，這並不代表雷震放棄了由胡適領導新的反對黨的期待。

1957 年 4 月 21 日，雷震寫信給在美國的王紀五，表示：「如無有力的反對黨，不僅民主政治沒有希望，根本上無改進之可能。我們希望張君勳與胡先生合作，合組成反對黨，則中國政治或有光明之前途」。⁵⁷ 只是評估外在的情勢，雷震也意識到「反對黨的希望亦不甚大」。⁵⁸

而在 1957 年 7 月，之前胡適與蔣廷黻籌組中國民主黨的傳聞，又在臺北的政治圈傳開。7 月 19 日成舍我（1898-1991）告訴雷震，王新衡（1908-1987）提到胡適與蔣廷黻在組黨，不過美國不贊成。

（1953-1954）第一個十年（五）》，頁 242。

⁵⁴ 雷震：1954 年 3 月 13 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5》，頁 244。

⁵⁵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13）》（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2008 年），頁 197-198。

⁵⁶ 雷震：1957 年 3 月 1 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39。

⁵⁷ 雷震：1957 年 4 月 21 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74。

⁵⁸ 雷震：1957 年 4 月 21 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74。

王新衡認為：「美國政府是支持國民黨，其情報機關如支持其他方面，政府也不介意。」⁵⁹8月2日雷震與王世憲（1908-1993）、胡秋原（1910-2004）、張佛泉等人在臺中談及組黨事宜，認為：「中國政治如欲使其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必須有一個有力的反對黨，為今之計，最好在國民黨以外，聯合在野人士（無黨派人士、民青兩黨人士）及國民黨一部分開明分子組成，目前絕對不能執政，只要有監督力量，批評政治，使其實行民主政治，實行法治。」胡秋原與胡適的互動雖沒有收到答應的回信，卻認為胡適可能願意領導。⁶⁰相對地，王世杰與雷震見面談話時，以西班牙為例，認為：「一黨專政國家，無法繼續下去，蘇俄中共均是一樣。」⁶¹不過，王世杰不僅不贊成「以現有政治力量如民青兩黨加入為反對黨」，也表示胡適「不會和政府鬧翻」。⁶²

由於傳聞不斷，《聯合報》找了毛樹清（1917-1997）在美國訪問胡適有關反對黨的事，胡適受訪後，寫了長信告訴雷震他回覆毛樹清對反對黨的態度：「這一年來，香港、臺北的朋友曾有信來，說起反對黨的需要。但我始終沒有回過一個字，沒有覆過一封信，因為我從來沒有夢想到自己組織任何政黨。」而且在1956年，胡適就對「國民黨的朋友」表示，已經放棄「國民黨自由分化」反對黨的希望。而「希望國民黨的領袖走『毀黨建國』的新路」，至於胡適「自己當然沒有組黨的心思。」⁶³他還「勸告」雷震，有關他和蔣廷黻在美國組織自由黨的傳聞，「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事實做根據」。而丁月波和雷震來信提到「反對黨必須」胡適「出來領導」，他「從沒有回信」，因為「從

⁵⁹ 雷震：1957年7月19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133。

⁶⁰ 雷震：1957年8月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141。

⁶¹ 雷震：1957年8月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141。

⁶² 雷震：1957年8月15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147。

⁶³ 〈胡適致雷震（1957年8月29日）〉，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0》，頁359-360。潘光哲主編：《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頁1957。

來不曾作此想。」還告訴雷震：「老兄千萬不可妄信外間一切像煞有介事的傳說，千萬不可輕易假定胡適之可以（或能夠）出來領導一個反對黨。」⁶⁴

不過，胡適本來就贊成組織反對黨，因此他也表示想組織反對黨：「應該自己把這個反對黨建立起來，應該用現有的可靠的材料與人才做現實的本錢，在那個現實的基層上，自己把這個新政黨組織起來。胡適之、張君勱、顧孟餘……一班人都太老了，這些老招牌都不中用了。」⁶⁵

胡適在 1957 年 8 月 30 日日記中，則記載：「寫長信給雷傲寰，勸他們切不可輕信流言，說胡適之可以出來領導一個反對黨。」⁶⁶由於前述信中胡適記下是 29 日夜寫的，因此才記載在 30 日的日記。

雷震在 9 月 12 日收到胡適的信，「說他不能領導反對黨」。⁶⁷也了解胡適「沒有自信他可以領導一個反對黨，勸我們根據此地現有之材料從速組織起來，不要靠他，以免失望」。⁶⁸不過，雷震仍鏗而不捨寫信回覆胡適，除了表示：「希望他對新黨，一如他對《自由中國》之關係，只負名義上之領導，實際工作由我們來做」之外，還列舉了請胡適擔任反對黨領袖的八大理由：

- 一、他贊成中國要有反對黨。
- 二、他為四十年來民主自由思想的領導人。
- 三、民青兩黨之合不攏來，因領導人問題。

⁶⁴ 〈胡適致雷震（1957 年 8 月 29 日）〉，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0》，頁 360-361。

⁶⁵ 雷震：1957 年 8 月 29 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0》，頁 361-362。

⁶⁶ 胡適：1957 年 8 月 30 日日記，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 9（1953-1962）》，頁 306。〈胡適致雷震（1957 年 8 月 29 日）〉，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0》，頁 359。

⁶⁷ 雷震：1957 年 9 月 12 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161。

⁶⁸ 雷震：1957 年 9 月 13 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39》，頁 162。

四、國民黨自由分子與無黨派之自由份子需他出來領導。

五、新反對黨要以臺灣為重心，臺灣人認他為鄉親。

六、對外關係上，尤其對美關係上。

七、影響大陸人心。

八、當權者怕出來。上面這些理由都是當權者所畏懼的理由。⁶⁹

至於雷震的友人看了胡適給雷震的信，⁷⁰或是收到胡適的信，⁷¹對於胡適不想組反對黨的態度都有所認識。但是雷震仍一本初衷，和朋友的聚會中，仍「主張新黨要有領導人，以胡適之為最適宜，今日除胡先生出來外，不會有團結國民黨以外之力量，甚至國民黨亦有一部分來參加的。」⁷²

雷震的想法，實際上也反應一些人主觀的期待。夏濤聲（1899-1968）就表示：「另有一說法，即國民黨分為二個，一由陳誠（1897-1965）領導，一由蔣經國（1910-1988）領導，蔣先生自己退出，此外合民青兩黨及無黨無派組成一黨，最好由胡先生出來領導」。⁷³

當然這只是在臺灣期待組織反對黨的部分菁英期待胡適領導的想法，胡適並不同意。

（三）與臺籍菁英組黨過程中的胡適

前述反對黨的組成構想，提出了「無黨派」的部分，也隱涵了包括參與選舉的無黨籍臺灣本土菁英的傾向。這在 1958 年以後，逐漸

⁶⁹ 雷震：1957年9月19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164-165。

⁷⁰ 雷震：1957年10月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172。

⁷¹ 雷震：1957年10月7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176。

⁷² 雷震：1957年10月28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182。

⁷³ 雷震：1958年2月28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236。

被正面提出。

1958年4月8日年，胡適抵達臺北。⁷⁴ 雷震也持續試圖說服胡適，在與胡適兩人長談後，除了胡適原本就不反對組織反對黨之外，胡適也曾表示「可以加入」。⁷⁵ 4月20日胡適與雷震等友人餐敘，除了表示：「自己對政治無興趣，不配做領袖。」對於反對黨，則說：「你們搞好了，他一定參加。」在某種意義上，胡適是贊成組織反對黨，不過縱使要參加，也要反對黨「搞好了」。⁷⁶

5月24日，「約齊世英吃飯，另約成舍我、胡秋原、陶百川（1901-2002）、程滄波（1903-1990）、王世憲、王師曾（1903-1983）、夏濤聲、端木愷（1903-1987）作陪」，飯後並對反對黨交換意見。齊世英表示：「臺灣人正苦悶，如果反對黨能把臺灣匡入，可減少流血之慘。大家認為胡先生不肯跳火坑，是一件可惜的事，因非他來領導，是搞不起來的」。⁷⁷ 兩天後，雷震把他和外省人自由派菁英友人的意見向胡適表達：「大家認為胡先生如出來組黨，可以把臺灣匡入，省得流血。因為臺灣人對國民黨及現政府之惡感太深也」。胡適則回應：他不是組黨之人，又說自己年紀大了。⁷⁸ 之後，夏濤聲、成舍我等人也持續向胡適勸說，成舍我還向胡適表示，「並不是他們才能不行，是聲望不及」。⁷⁹ 曾經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美國人馬丁也向雷震表示，胡適出面組黨，除了可以促成原本的反對派跟進外，而且國民黨當局如果因此逮捕胡適，「全世界震驚」。如果只是雷震組黨被捕，「大使館可能問一問」而已。⁸⁰

⁷⁴ 胡適：1958年4月8日日記，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9（1953-1962）》，頁325。

⁷⁵ 雷震：1958年4月9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263。

⁷⁶ 雷震：1958年4月20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271-272。

⁷⁷ 雷震：1958年5月24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294。

⁷⁸ 雷震：1958年5月26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295。

⁷⁹ 雷震：1958年5月29日日記、1958年6月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298、300-301。

⁸⁰ 雷震：1958年5月3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299。
有人認為馬丁可能是韋慕庭，待考。〈C. Martin Wilbur（韋慕庭）的名

1958年6月2日，胡適打電話找雷震去談話，雷震除了轉告馬丁的意見外，也轉告成舍我建議的兩個辦法：「第一是大家組織成功，請他任主席」，胡適可以不表示就任，但也不要推辭。「第二個是設一個九人或多少人的委員會，請他為委員之一，如他在《自由中國》社編輯委員之地位，不必自己時常出席。」雷震想的是第一個方式。胡適還是回覆：「他認為他不能做」，不過態度似乎沒有過去的堅決。離開後，雷震去看王世杰，王也表示「贊成成立反對黨」。⁸¹夏道平跟雷震說：胡適的「朋友搞政黨的很少，如能請雪艇參加」，胡適可能會來，希望雷震去勸王世杰。雷震記載打算次日拜訪王世杰，⁸²雷震第二天早上去看「王先生」，王表示沒有意願。⁸³

6月6日雷震與夏濤聲、陶百川、成舍我、程滄波、王世憲、胡秋原、劉博崑（1906-1976）、端木愷會談關於邀請胡適組黨的事，認為：「還是希望胡先生來領導，則比較輕而易舉。如胡先生不出來，我們還是要搞的」。而在具體方法上，可以以「《自由中國》和《民主潮》為中心，開座談會，要使青年參加」，「又須和臺灣人、美國人聯絡」。⁸⁴胡適態度消極，反對派人士則持續趁機說服。民社黨的王世憲和青年黨的陳啟天勸胡適出面領導新黨，胡適則回應：「一點基礎沒有，如何能擔任」。雷震對此樂觀的解讀：「聽胡先生的話，胡先生對新黨不一定堅持不來領導也」。⁸⁵

另一方面，在外省籍自由派菁英之外，臺灣本土菁英也積極結社。1958年8月2日，宋霖康約餐敘，雷震聽到「自治研究會」的

片），冊名「名片、訪客簽名簿及登記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館，館藏號 HS-NK05-340-053。

⁸¹ 雷震：1958年6月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301。

⁸² 雷震：1958年6月5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304。

⁸³ 雷震：1958年6月6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304。這裡的王先生應該就是王世杰，《雷震日記》另一位常提到的是王世憲，雷震是當天晚上和他見面的。

⁸⁴ 雷震：1958年6月6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304。

⁸⁵ 雷震：1958年7月16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332。

進度：「發起人已有七十七名，委員二十九名，常委七人為吳三連（1899-1988）、高玉樹、李萬居、郭雨新、王地、許世賢、李元載（應為李源棧，1910-1969）。二十九委員中省議員有十二人，縣市議員有十二人。」雷震認為：這是「反對黨之先聲。惟此組織地方色彩太重，將來可能流血。」他也記下，過去找胡適「出來領導」，「就這一方面說，可以消滅臺灣和內地人之隔閡，但可減少流血」。⁸⁶ 8月15日，雷震再將這件事寫信告訴胡適：「自治研究會章程附閱，謂胡先生如出來組反對黨，不僅可消滅臺灣人內地人之隔閡，但可防止流血。」⁸⁷

之後，雷震在日記中記下他和友人勸胡適出面擔任領導人的記錄。1958年11月，胡秋原去勸胡適，胡適回說：「他不是愛惜羽毛的，在此時愛惜羽毛是下流，惟他對政治太外行，故須考慮。」另一方面，胡適也注意他和國民黨的關係，表示：「對此事他還要和蔣先生談一談」。⁸⁸ 胡適也告訴雷震：「有人勸他不要和臺灣人多來往」。⁸⁹

1959年2月6日，雷震拜訪陳啟天，請他去見胡適。⁹⁰ 1959年2月15日，陳啟天與胡適見面，胡適日記記錄：「陳啟天先生中午飯，飯後長談」。⁹¹ 2月17日，陳啟天告訴雷震胡適的回應：「政府對他行動甚為注意」。⁹² 胡適態度消極，雷震和主張組黨的友人十分憂慮。夏濤聲在1959年4月勸雷震，「如胡先生不來，不妨自己任領袖」。⁹³ 5月20日，胡適和雷震、夏濤聲會面，表示：「臺灣人感到受

⁸⁶ 雷震：1958年8月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346。

⁸⁷ 雷震：1958年8月15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352。

⁸⁸ 雷震：1958年11月2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406。

⁸⁹ 雷震：1958年11月29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頁414。

⁹⁰ 雷震：1959年2月6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40：雷震日記（1959-1960）第一個十年（八）》，頁22。

⁹¹ 胡適：1959年2月15日日記，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9（1953-1962）》，頁394。

⁹² 雷震：1959年2月17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40》，頁28。

⁹³ 雷震：1959年4月27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40》，頁76。

壓迫，多數受治於少數，對臺灣人權益應提高。他認為反對黨有必要，但他無意組黨。」⁹⁴

胡適的態度沒有改變，外省籍自由派菁英的組黨也沒有進展。1960年蔣介石三連任，原本期待蔣介石卸任後，局勢改變的期待落空，憲政秩序也遭到嚴重破壞。雷震和胡適一起吃飯後問胡適：「今後怎麼辦？」胡適回說：「只有民青兩黨和國民黨民主派和臺灣人合組反對黨，如果組成了，他首先表示贊成，他自己不參加，留幾個無黨無派份子比較好，如果他參加，我們推他做主席，那便無法推卸了」。⁹⁵ 雷震對於胡適主張必須和臺灣人合組反對黨的建議，有深刻的印象，並在之後向傅正（1927-1991）說明他的看法。⁹⁶ 而臺灣本土菁英也積極試著遊說胡適，雷震在1960年3月21日去看吳三連，吳三連告知，「日前齊世英也來說過」，而「蔡培火過去也請胡先生出來過，他可以脫離國民黨而加入這個團體，但是胡先生未答應」。⁹⁷ 吳三連認為：「除非胡先生出來，這個反對黨是組織不成功的」。⁹⁸ 會商之後決定由吳三連和「楊肇嘉和蔡培火談過後，再約胡先生一談」。⁹⁹ 4月13日，雷震和夏濤聲再去拜訪胡適，雷震建議胡適應該從中央研究院退休，「來發起反對黨之事；做一年即辭去，任顧問，

⁹⁴ 雷震：1959年5月20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40》，頁92。

⁹⁵ 雷震：1960年3月16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40》，頁270-271。

⁹⁶ 傅正：1960年4月20日日記，收入潘光哲編：《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頁298。傅正記載：「據雷公今天跟我說起：前些時有一次單獨探望胡適先生時，胡先生曾向他感嘆的表示，中國這局面沒有希望，除非有一個反對黨出來。但是，當雷公希望胡適先生出面領導時，正式發表聲明，要求全世界支持這個組織。據說，胡先生還特別提醒雷公，要組反對黨，必須聯絡臺灣的地方人士。雷公由於胡適先生態度的轉變，感到興奮，甚至很樂觀地認為，一年內一定組成。我雖然也因為胡先生由於住在臺灣的時間較久，對臺灣現實政治的認識比較清楚而感到安慰，但因為我深知胡先生的性格，不是一個可以斷然決然從事政治運動的人，所以並不如雷公那樣樂觀。」

⁹⁷ 雷震：1960年3月2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40》，頁274。

⁹⁸ 雷震：1960年3月2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40》，頁274-275。

⁹⁹ 雷震：1960年3月21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40》，頁275。

由副的代理」。胡適仍然不肯。¹⁰⁰ 夏濤聲請胡適做發起人，胡適「只說你們做好了，他可立刻聲明支持」。¹⁰¹

而臺籍菁英也積極運作，1960年5月4日「吳三連約胡適之先生吃晚飯，其餘有楊肇嘉（1982-1976）、郭雨新、李萬居、蔣勻田（1903-1994）、夏濤聲、王世憲、齊世英」和雷震共十人，飯畢交換意見。郭雨新「請胡先生出來組反對黨」，胡適「勸他們幹，因有臺灣人的民眾也」。夏濤聲也勸胡適出來。¹⁰² 不過，胡適仍不肯答應。

之後，以臺籍菁英爲主的選舉座談會積極運作，往組黨的方向前進。以雷震爲首的外省籍自由派菁英，也積極參與。至於胡適則對新黨籌組，十分高興。¹⁰³ 選舉檢討會後，5月25日雷震和夏濤聲向胡適「報告那一天檢討會之事」，胡適則表示「不和臺灣人在一起，在新黨不會有力量」。¹⁰⁴ 當天選舉座談會聚餐，胡適也到場，「語多勗勉，並向新黨道賀」。¹⁰⁵ 雷震的國民黨有人告知，「胡適之先生對新黨很願意支持」，並願和蔣介石討論此事。¹⁰⁶ 不過，胡頌平（1904-1988）的記錄則和此相反。1960年6月3日的記錄：「雷震、夏聲濤來訪，先生勸他們不必組織反對黨，而且預料得到一定沒有結果的。他們不很接受先生的勸告，只好由他們去了」。¹⁰⁷ 1960年6月30日則記載：

上午，雷震、夏聲濤來看先生，請求先生支持他們的反對黨，大概9月間要組織成立了。先生說：「我不贊成你們拿我來作武器，我也不牽涉裡面和人家鬭爭。如果你們將來組織成一個像樣的反對黨，我可以正式公開的贊成，但我決不參加你們的

¹⁰⁰ 雷震：1960年4月13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40》，頁289-290。

¹⁰¹ 雷震：1960年4月13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40》，頁290。

¹⁰² 雷震：1960年5月4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40》，頁301。

¹⁰³ 雷震：1960年5月22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40》，頁314。

¹⁰⁴ 雷震：1960年5月25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40》，頁315。

¹⁰⁵ 雷震：1960年5月25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40》，頁315-316。

¹⁰⁶ 雷震：1960年6月8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40》，頁325。

¹⁰⁷ 胡適：1960年6月8日日記，收入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增補版（九）1960》（臺北：聯經，2015年），頁3271。

組織，更不給你們作領導。」¹⁰⁸

7月2日的記載，則態度較為正面：「晚上，雷震、夏聲濤同他們的『選舉改進委員會』召集人等為先生餞行。」胡適表示：「他個人贊成組織在野黨，並且希望在野黨強大，能夠發展制衡的作用，以和平方式，爭取選民的支持，使政治發生新陳代謝。」¹⁰⁹

而胡頌平聽到別人的傳言，都是較為負面的。例如有「人說：先生曾對他們說，現在只有臺灣一塊地方，我們要靠這塊土地回大陸的，不能把現在的政府力量分散，一再的勸他們不要組織反對黨」。¹¹⁰

當天的餐會，胡適也希望新黨要注意「容忍」，「希望新黨要有容忍精神」，覺得「第一次聲明書在罵人」。席間楊金虎（1898-1990）等人仍積極表示希望胡適可以領導，胡適仍然不願意。¹¹¹ 胡適的態度，大眾媒體也有報導。胡頌平在1960年8月1日就記下了：「今天出版的 *China News* 報上有一篇社論說：我們已經知道胡先生的態度了。他不會出來領導反對黨，也不會做反對黨的顧問。*China Post* 也有一篇談反對黨的社論，也說先生不會出來做領袖。」¹¹²

而雷震等人希望在胡適返臺時宣布組織新黨，胡適不同意，對於新黨的態度也更消極。1960年8月初，胡適寫信給雷震，表示：雷震7月認識的國民黨對新黨的組織太樂觀了，而「你們的黨還沒有組成，先就痛罵人，先就說要打倒國民黨，先就『對國民黨深惡痛絕』。國民黨當然不會『承認』你們的黨了。」盼望你們千萬不要「盼俟先生到臺後再宣布」（組黨宣言）。這一點同我6月中勸你們不要在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1-1969）總統到臺北之前幾天

¹⁰⁸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增補版（九）1960》，頁3305-3306。

¹⁰⁹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增補版（九）1960》，頁3309。

¹¹⁰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增補版（九）1960》，頁3309-3310。

¹¹¹ 雷震：1960年7月6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40》，頁340。

¹¹²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增補版（九）1960》，頁3332。

發表你們的宣言，是一樣的意思。你們當時不聽我的勸告，現在我很鄭重的勸你們千萬不要等候我『到臺後再宣布』。」因為胡適對他自己可能的回應十分保留：「你們的想法、看法、做法，我往往不能了解。我的想法、看法、做法，你（單指老兄）也往往不能了解（別人更不用說了）」也無法預知「組黨宣言發布時我能取什麼態度。所以我勸你們千萬不要等候我」。¹¹³

就這樣，在新黨組織前夕，胡適的態度更為保守，甚至連面對日後組黨宣言的發布後，也不能預先表態。中國民主黨的籌組工作也在沒有胡適支持的狀況，更積極展開。直到9月4日雷震被捕，中國民主黨的組黨工作遭到重挫。

四、結論

在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到臺灣前後，支持蔣介石具自由、民主傾向的外省籍菁英，以王世杰、雷震為首，期待由胡適出面，結合國民黨外共同政治主張或是政治取向的菁英，推動民主反共的事業。而這樣的工作，胡適基本上抱持一定程度的肯定，包括《自由中國》雜誌或者是自由中國同盟，但是胡適對於自己擔任領導人則相對抱持著保留的態度。

中華民國政府在1949年12月敗退到臺灣之後，也傳來蔣廷黻在美國找胡適共同組黨的消息。從後續的資訊來看，胡適確實參與了蔣廷黻中國自由黨黨綱內容的草擬修訂工作，或許也曾經一時動搖，答應要和蔣一起組黨，但是，最後他還是選擇了不參加中國自由黨。這樣的選擇對胡適之而言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他認為自己不適合參加政治行動。在臺灣的王世杰、雷震等人，一開始並不了解胡適對中國自由黨的最後選擇，因此一邊思考如何因應此一新的發展，同時仍

¹¹³ 雷震：1960年8月4日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0》，頁437。

希望將胡適的選擇與原本自由中國同盟的構想結合，直到胡適寫信給王世杰，告知自己不適合政治工作，因此選擇不加入中國自由黨。至此，雷震仍然希望可以說服胡適出面領導原本構想的政治社團，也就是自由中國同盟。可是王世杰及其他朋友則認為，涉及政治胡適可能不加入，因此決定將自由中國同盟的方向往社會文化的方向發展，並去信要求胡適出面領導。由於無法了解胡適是否可以回臺灣領導此一組織，王世杰甚至認為只要胡適表示贊成即可，可是胡適終究沒有對此表達意見，而在1950年3月蔣介石復行視事之後形勢已然不同，自由中國同盟的工作至此也告一段落。

這並不代表胡適不支持在臺灣成立新的反對黨，因此在1951年胡適寫給蔣介石的信中，希望能夠有新的反對黨出現。或許為了避免蔣介石反對組織反對黨，胡適還提醒蔣介石，他曾經贊成胡適出面組織反對黨，只是胡適認為自己的能力勇氣不足以擔任。但是他認為由國民黨自己分裂成幾個在野黨是相當重要的發展方向，並認為在對內對外都有其需要，建議蔣介石趕快採行。蔣介石對此並沒有正面回應，而持保留的態度。不過，這樣的胡適，自然又成為1954年在臺灣外省籍自由派政治菁英籌組新的反對黨的重要領袖人選。無論是青年黨，或者是結合國民黨內的自由派人士與民青兩黨成立新的反對黨推動兩黨政治，胡適都是雷震跟他的友人持續討論的重要對象。不過，胡適對此始終不願鬆口。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固然支持成立反對黨，但是，如何取得蔣介石的支持，也是他關心的問題。

而這種以外省籍菁英為主體，透過原有政治結構內部權力的分流、重組過程，建立反對黨的構想，在1957年之後發生了改變。這是因為臺籍菁英也開始積極籌組政治團體，希望在地方選舉中與國民黨分庭抗禮，或是進行反對組織性的地方選舉競爭，而外省籍菁英也逐漸思考在原本的新黨組織架構中應該納入無黨無派的臺籍菁英，也就是將臺籍菁英納入在原本外省籍菁英籌組反對黨的思考架構中。而在此過程中，胡適仍然是雷震跟他的朋友們討論的重要領導人選。

胡適對於擔任政黨的領導人並沒有答應，甚至連是否參加新的反對黨也常常持保留的態度，但是胡適對於反對黨應該與臺籍菁英結合，則扮演積極推動鼓勵的角色。1960年，蔣介石三連任、韓國發生政變，國內外局勢丕變之際，雷震轉以臺籍菁英為主體的中國民主黨籌組工作，並結合他的外省籍自由派菁英的人脈，與臺灣本土政治菁英結合，使1960年中國民主黨的籌組工作，朝向一個在地方與國民黨競爭、在中央扮演制衡角色的反對黨的性質。在中國民主黨的籌組過程中，胡適則是外省籍菁英與臺籍菁英共同期待的領袖人選，只是胡適在這樣的組黨運動中仍然選擇缺席，僅扮演著一定程度支持反對黨、支持外省籍菁英與臺籍菁英結合的角色。而在組黨運動發表第一次宣言後，由於認為宣言內容過於激烈，特別是對國民黨的激烈批評，不容忍國民黨當局的作為，胡適對新黨的態度更趨保守，不僅不願擔任領導人，不願加入，而且連是否支持之後準備發表的「組黨宣言」，也持保留的態度。

至於胡適對組黨消極的態度，也與他和國民黨，特別尊重蔣介石的想法有關。胡適在1949年之後的行止，對蔣介石是十分尊重的，甚至連應邀到英國牛津大學任教，雖然在再三邀請下，回信表示接受聘約，但是在請示蔣介石的意見後，仍決定不到牛津大學。¹¹⁴ 在這樣的脈絡下，胡適對反對黨組織的態度，也受到國民黨當局態度的影響。胡適回應勸說他加入籌組反對黨行列時，提到他要與蔣介石談一下反對黨的組織問題或是政府十分注意他的行動。而在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當局時，對《自由中國》的言論越趨不再容忍的狀況下，胡適是以自由派人士應該容忍蔣介石及國民黨當局的態度來回應，以保守的態度希企得到蔣介石及國民黨當局對《自由中國》的容忍。¹¹⁵ 而在新黨組黨工作積極展開之後，胡適也期待新黨可以以「容忍（國民

¹¹⁴ 金恆煒：〈胡適：自由主義者還是蔣政權的捍衛者？〉，《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頁152-153。

¹¹⁵ 金恆煒：〈胡適的「容忍」與殷海光的「自由」〉，頁402。

黨)」的態度進行，避免遭到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當局打壓。中國民主黨籌組過程中批判國民黨當局的力道越強，胡適離反對黨的距離也更遠。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胡適放棄對臺灣出現反對黨的期待。

最後，中國民主黨的籌組工作在沒有胡適加入的狀況下，積極展開。1960年9月，組黨工作即將完成之前，雷震被捕。至於胡適則只能扮演有限的支援及救援雷震的角色。

徵引書目

《中央日報》

〈C. Martin Wilbur (韋慕庭) 的名片〉, 冊名「名片、訪客簽名簿及登記簿」,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館, 館藏號 HS-NK05-340-053。

〈王世杰致胡適函 (1950年3月31日)〉, 冊名「與王世杰的來往書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館, 館藏號 HS-US01-062-022。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7》, 北京:中華書店, 1985年。

朱文伯:〈理論與事實——漫談人權保障問題〉,《自由中國》第19卷第11期, 1958年12月1日。

牟力非:〈略論反對黨問題的癥結〉,《自由中國》第16卷第3期, 1957年2月1日。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40年》, 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1987年。

金恆煒:〈胡適的「容忍」與殷海光的「自由」〉, 收於金恆煒:《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 臺北:允晨文化, 2017年。

胡適:1949年6月28日日記,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 冊號「1949年日記」檔號:HS-DY01-1949-0628。

胡適:1949年6月30日日記,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 冊號「1949年日記」檔號:HS-DY01-1949-0630。

胡適著,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增補版(九)1960》, 臺北:聯經, 2015年。

胡適著,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4》, 臺北:聯經, 2004年。

胡適著,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8(1940-1952)》, 臺北:聯

- 經，2004年。
-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9（1953-1962）》，臺北：聯經，2004年。
- 胡適著，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
-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10）》，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2003年。
-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13）》，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2008年。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記（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
- 傅正：〈對本屆地方選舉的檢討〉，《自由中國》第16卷第9期，1957年5月1日。
- 傅正著，潘光哲編：《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
- 湯晏：《蔣廷黻與蔣介石》，臺北：大塊文化，2017年。
-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全集12：雷案回憶（二）胡適與反對黨》，臺北：桂冠，1989年。
-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0：雷震書信集——雷震秘藏書信選》，臺北：桂冠，1989年。
-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1》，臺北：桂冠，1989年。
-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2》，臺北：桂冠，1989年。
-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3：雷震日記（1951）第一個十年（三）》，臺北：桂冠，1989年。
-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5：雷震日記（1953-1954）第一個十年（五）》，臺北：桂冠，1989年。
- 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9：雷震日記（1957-1958）第一個十年（七）》，臺北：桂冠，1989年。

雷震著，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 40：雷震日記（1959-1960）第一個十年（八）》，臺北：桂冠，1989年。

潘光哲主編：《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 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

薛化元：〈臺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1949-60）：以反對黨問題為中心〉，《思與言》第34卷第3期，1996年9月。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新北：稻鄉出版社，1996年。